

何处不相逢  
——评《直面杨绛——一场跨界的对话》  
邱忠堂、刘晓婕\*  
内蒙古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呼和浩特

读书是精神的旅行，读一本有足够深度的书犹如在崇山峻岭中翻行。黎秀娥著《直面杨绛——一场跨界的对话》（北岳文艺出版社，年月，（是对当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以下敬语全略（其人其书所作的“跨界”式研究。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运用对话式的研究方式，深入到杨绛作品本质层面以探究杨绛内心的声音，在灵魂深处展开同情地体贴和真挚地交流。

毫不夸张地说，本书开创整体性杨绛研究的先河，是当代文学领域打破流行研究藩篱而建立“对话式”研究范式的先驱，也是古典哲学精神的当下再现。作者成功走进杨绛的思想空间，觅着其脚步，随其进入一个个领域，带着骨子里对她的热爱和尊重，探其哲思、观其戏剧，品其散文、思其小说、会其译作。这些，无不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与研究对象的惺惺相惜。

笔者以为，本书最大的亮点，是作者选择“对话”的研究方式来自自然地、娓娓地述说对杨绛的热爱、疑惑以及异见。我们猜测，这或许是受杨绛晚年作品《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的行文风格影响而触发的灵感。诚如作者所言，“为了拉近与研究对象的距离，我选择了对话体，就这样，我磨平我的文字，使之轻快、平静，像一场轻松而不失严肃的学术散步，走到哪里，谈到哪里，没有赶时髦的成分，也不像当年研究胡风派时那样有强烈的使命感萦怀，只是仿佛在记录一场发生在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中的自然而然的相遇。”（《直面杨绛——一场跨界的对话》，。下引只注页码。（作者与杨绛的自然相遇，如春雨润物般地与读者不期而遇。以书为媒，同心相连，作者与杨绛的“跨界对话”是灵魂的碰撞、学术的激荡。人生何处不相逢，妙哉。

文学与哲学之间，不存在所谓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学以美学的方式表达着哲学，用与人距离最近的生活元素使哲学富含血肉，将“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奥哲思淋漓尽致地呈现于文学的海洋。人生无限哲思尽付诸戏剧、散文、小说、译作，这便是杨绛文学的精妙处。于此，作者不惜笔墨，在书中第二、三、四、五章，深入挖掘出杨绛作品的精髓。

如果说，杨绛在作者心目中是一个践行哲学的非哲学家，那么作者深层的诠释逻辑是：杨绛是文学家又是哲学家，是哲学性文学家又是文学性哲学家。杨绛是文学家，对世界、人生又有着极其妥帖的哲学理解，其本身的心性修养出入于哲学和社会现实之间。不是很笃信哲学的她，将哲学内化，用文学表达出自我、追寻真理。通过作者的笔触，我们能够看到，在晚年著作

\* 作者：邱忠堂，内蒙古师范大学法学学院副教授；刘晓婕，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

《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充满着哲学性疑问，且诸多疑问似乎在杨绛那里已有答案，只不过是未曾言明的，避免了“言语断道”。当然，这不是偶然的，杨绛之前的作品也多有对当时哲学观点的映射。可见，杨绛晚年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深深触动了作者的内心。在全书开篇的第一章，便是对杨绛洋洋洒洒的赞美之词，战乱与潦倒中，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她留守祖国；她处变不惊、悠然自若于非议她的时代。杨绛似乎享受着在苦难中磨练自己的修行过程，因为她参透了苦难可以使自己获得真实，“知命”的生活让心灵更加安详而幸福。

在中西哲学的世界里，作者找到了杨绛与先哲之间思想的相契。杨绛“灵魂的冶炼”接近老子的“‘道’之探寻”，同时也可看作是对斯多葛学派为代表的“自由”思想的实践，作者说杨绛对自己的修身之道说得很笼统，只有结合其实践才能真正将之充实起来，所以她说的少做的多，而从其作品看，她说的浅却做的深。所以，作者才说：“你有意识地走向哲学时已经人在老境，那是你一生思索的必然趋势。然而，真正领会你的自由哲学却必须逆时间之流而上，回到你生命早期的文学，尤其是你的戏剧中，回顾你当时的切实处境，体会你与哲学相遇时的真实心境。你不像萨特那样有清醒而自觉的把文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的意识，你文学中的哲学就像你本人在人间的状态一样，裹着一层‘隐身衣’，以其表面上的‘隐’挡住了一些不相干的人，也因存在之真，吸引着心有灵犀的人们驻足、凝神、沉思。”（）这应是作者的肺腑之言，同时也是全书的关纽。

总之，作者看到的是一位骨子里饱含贤哲智慧的作家，跟随其跨越中西，贯穿古今，无论是古代希腊和先秦的思想，还是西方现代和中国近代的智慧之光，融进作者心灵，化为解读杨绛的独特视角，频现于每一章节中。

### 三

《老子》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作者笔下的杨绛很像老子心中的“圣人”，她“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做着削减作为、致虚守静的修养工夫，追求着“为腹不为目”的内在宁静恬淡，从不欲先于人、先于世。

作者言：“在新中国前三十年，搞学术的郭绍虞等，搞创作的曹禺、老舍等，脊梁纷纷被扭曲或折断，你的脊梁始终是直的。”（）这是对外在虚名俗利的不屈从，同时也是对内心真挚沉静的执着。“曲则全，枉则直”，作者赞叹杨绛在非议横飞的年代做出“曲”的姿态以应世，心中却执守着一份“清心”。《老子》说“少则得，多则惑”，作者看到了杨绛内心坚定而澄澈的信念，这信念不是让她去掀起风浪与时代抗衡、与非议纠缠，也不是让她就此俯伏沉默于潮流之下、不思真理之道的存续。恰恰相反，在作者笔下，心中自明的杨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缘由，便了了了，即“不停地冶炼自己”。这是本书的主线，自每一章贯穿于直至最后一章“人生边上的总结”，无一不是对杨绛思考人生与灵魂关系之心路历程的诠释。

在最后一章，作者就杨绛的人性善恶问题与灵魂观进行了深入探究、细致分析，并作出客观而温和的批评。杨绛通过宗教得以走进了更加神秘的层次，而作者通过哲学反思了杨绛的人性观，并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和观点。通过作者的发问与思索，读者很自然地引到善恶与灵魂思考的十字路口，不由自主地进行自我追问和探索：杨绛“不落言筌”的观点是什么？作者疑惑着什么又述说着什么？一场以心会心的交锋，使一些朦胧恍惚的问题清晰了，使作为他者的读者通透了。相继启发，打开人生问题的思考之门，进行关乎生命的反思。

---

#### 四

作者成功地把杨绛以一个前所未有的圆融形象实体呈现给读众，以最质朴的感受为序呈现了杨绛的人生哲学。从“戏剧中的精神游牧”）第二章，（到“散文中的诗意还乡”）第三章，（再到“小说中的反抗与解蔽”）第四章，（时代和民生就在她的作品里，作品反映的就是她的心灵。作者将第五章“在翻译中扼住时代的咽喉”作为其独特的研究，探讨了杨绛在时代变革和人生转折之际的思考，偏偏倾注于下层人的幸福。在作者看来，此是何等的夺目。也许作者与杨绛一样，关注下层人的幸福问题不是因为有多崇高的济世情怀，而是源于实实在在的贴己感受。作者说“呈现复杂的人性是你的译著的必然使命”（），关注复杂的人性和社会现实问题，或者是杨绛所知的“命”。仅此一点，作者定是感之切而思之深，说她最懂杨绛，似不为过。作者凭藉着自己独立的思考，与杨绛对话，不是单纯地迷恋，也不是一味地赞叹。与其说作者在杨绛身上看懂了许多，不如说作者与研究对象间产生了深度共鸣。

作者评杨绛译作说：“于是，你擎起双手，想扼住时代的咽喉。你找到了当时的时代病症的根源之一，并着手医治，用力之勤，用意之诚，用志之坚，实不多见。然而，人性毕竟不是时代问题的唯一根源，甚至在很多时候也不是主要根源，这是你的局限。”（）杨绛把诸多问题侧重于诉诸人性，在作者看来这是不全面的，甚至认为这样局限了其对社会的思考。此处或有商榷的余地，即：杨绛之所以将根源之一的人性当作主要根源、甚至是唯一根源，因为她看到所有问题最终都要回归到人性。社会的伪与杂，或有许多针砭的视角和整治方策，但都离不开作为根源的人性。

最后，不得不说，作者对杨绛的研究甚是深刻。通过本书，我们似乎懂了杨绛，及其作品和时代。作者思路清晰而富有逻辑，文笔流畅飘逸，让读者倍感愉悦，能激发汹涌而宁静的向上力量。